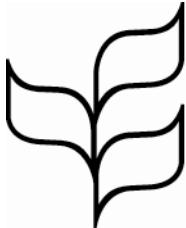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十二届会议

2014 年 10 月 6 日至 17 日，大韩民国平昌

临时议程*项目 14

执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所需资源全球评估高级别小组

执行摘要

执行秘书的说明

1. 在第 XI/4 号决定的第 24 段，缔约方大会欢迎高级别小组关于执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全球资源评估的初步结论，并邀请高级别小组与能够提供更加自下而上办法的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协作，在组成扩大的情况下继续努力，并就其工作的成果向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作出报告。

2. 据此，执行秘书经与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协商，建立了执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所需资源全球评估高级别小组的第二阶段。通过 15 名基础广泛的区域平衡的专家，并借鉴区域补助评估，高级别小组与其他相关倡议协作，对这一评估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办法。

3. 本文件的附件提供了高级别小组第二阶段报告的执行摘要，包括主要的信息草案，供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审议。还提供了高级别小组的报告全文以及 6 份区域辅助评估。¹

Distr.
GENERAL

UNEP/CBD/COP/12/13/Add.2
28 August 201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9 月 11 日重新张贴，对脚注 1 作技术性更正。

* UNEP/CBD/COP/12/1/Rev.1。

¹ UNEP/CBD/COP/12/INF/4。

附件

高级别小组第二阶段报告执行摘要²

为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筹集资源

评估《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目标》的惠益、投资和资源需要

² 由高级别小组倡议编制。见附录。

本报告的编制得到了由 Sarah Smith（环境规划署世界养护检测中心）和 Matt Rayment 及 Mavourneen Conway（ICF International）组成的综述小组的支持，Ravi Sharma 和 Tristan Tyrrell（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协助高级别小组的工作。

这里所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高级别小组成员或观察员所代表各国政府和组织的正式意见。

执行摘要

导言

执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所需资源全球评估高级别小组持续工作的目的是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之前关于资源调动的讨论。本报告以第一个高级别小组报告提出的全球资源评估为基础，查明了落实各项爱知目标、其投资和资源要求的好处。报告还分析了应如何使生物多样性投资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惠益与现有的政策保持一致，以确保带来成本效益。

第一个高级别小组的结论概述

第一个高级别小组（HLP 2012）提出了到 2020 年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全球费用评估，估计每年将需要 1,500 至 4,400 亿美元。小组确认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并若实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对于帮助确定这些估计至关重要。小组强调，资源需要并非给生物多样性开出的“账单”，但却要求改变我们经济中资源分配的方式，以期取得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成果。报告补充说，大量的因素影响了大量资金的需求。特别是，各项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协同增效意味着，

落实一项目标的办法、资金来源以及交付的成效有可能影响其他方面的投资需要。高级别小组强调了落实目标的重大惠益，以及对于其他部门的共同惠益，并认为，通过执行爱知目标实现的惠益有可能远远大于成本。但是，该小组也认识到，各国必须制定适当和协调统一的政治和体制框架，包括政治意愿，以确保实现这些惠益和协同增效。

方框 1– 高级别小组第一阶段的主要信息

1. 执行和实现《目标》需要制定适当和一致的政治及体制框架并拥有强有力的政治意愿，特别是在国家和区域各级；
2. 投资“自然资本”将为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共同惠益；
3. 现有证据表明，惠益可能大大超过了成本；
4. 实现各项目标所需的相对投资规模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实现一项目标所需的投资与目标的重要性之间不一定存在相关性；
5. 许多因素影响着实现每一项目标所需的总投资和持续支出的估计数。这些因素包括为每一项目标确定的行动和活动的范围和各项目标之间潜在的协同增效以及数据和方法方面的不足产生的不确定性。
6. 各项目标本身之间及目标与其他国家政策目标之间存在需加以考虑的许多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
7. 各种国际和国家来源及不同政策领域需予以筹资，以确保从实现爱知目标中获得充分的经济和社会惠益；
8. 进一步研究至关重要，有助于完善和界定这些估算数。

缔约方大会的决定和高级别小组的任务

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邀请高级别小组与能够提供更加自下而上的办法的其他倡议合作，在组成扩大（区域平衡的新的小组成员）的情况下继续努力，并就其工作的成果向缔约方大会第十二届会议作出汇报（第 XI/4 号决定）。

高级别小组的主要目标（工作范围）是：

1. 评估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惠益，审查直接的生物多样性惠益以及所需投资和政策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更广泛的惠益；
2. 评估为实现各项目标需要开展的活动的成本范围，同时亦顾及高级别小组提交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的报告中建议的进一步的工作；
3. 查明各种机会，确保生物多样性部门和整个经济领域采取的行动取得最高成本效益，动员/更好地利用资源在实现爱知目标方面取得最大的进展。

在其工作的第二阶段，小组借助了第一次报告的结论，提出了更加自下而上的办法，更多地虑及区域性证据，并更多强调实现目标的成本和效益、成本效益高的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与其他政策议程的协同增效。

高级别小组的工作安排

自 2012 年成立以来，高级别小组及其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巴西、因醋、日本、挪威和联合王国政府的共同资助。因此，这些国家以及环境规划署、开发计划署、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全环基金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代表密切参与了为该小组的工作提供便利。继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后，高级别小组于 2013 年 5 月 30 日至 3 日（挪威特隆赫姆）、2013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印度钦奈）和 2014 年 4 月 14 日至 15 日（巴西巴西利亚）举行了三次会议。会议审查了关于报告编制工作的进展及其结论，审查期间收到了反馈。

组织进行研究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为支持高级别小组第二阶段，委托进行了一项研究项目。这一工作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和承包。

组织进行这一研究是为了通过 6 家区域性研究咨询机构，收集不同国家、区域和不同地理范围的倡议的自下而上的证据，这些咨询机构审议了来自国家来源的数据。这一证据支持了各项目标同广泛的政策议程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完成不同层次的单项目标的成本与惠益之间的相互关联。本报告借鉴了区域报告，还有全球性的分析，提出了汇总后的证据以及来自区域性评估的个案研究。高级别小组从评估中总结出 10 项主要信息，随后利用这些信息组织了提出的证据。此外，为了确保资源的长期、稳定和可预测地增加以便实现爱知目标以及相关的 2050 年愿景，高级别小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强调需要采取行动确保各经济体和社会所作计划和决定尊重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主要信息

主要信息 1:

实现爱知目标将给世界人民和各经济体带来实质性惠益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基本理由的主要部分是，“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发挥作用和提供对于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它给了我们粮食安全、人类健康、以及清洁的空气和水；它为地方生计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对于实现包括减贫在内的《千年发展目标》是不可或缺的。”

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的评估都强调了生态系统提供的重要的供应、调节、文化和辅助服务的实质性价值，以及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以及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各种行动的惠益。

有力的证据表明，围绕广泛的爱知目标采取的生物多样性行动，对于社会、各类生态系统以及全世界所有地区都具有惠益。

主要信息 2:

生物多样性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生物多样性是实现现行和未来的各种规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强大动力，包括涉及粮食安全、水安全、生计、气候变化、减少灾害风险的目标及其他发展目标。

对生物多样性和爱知目标执行工作的投资，将带来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共同惠益。爱知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面，包括减贫、土著和地方社区权利、长期粮食安全、人类健康、缓解气候变化、适应力和恢复力；以及与生态基础设施、³ 地方生计、和创造就业机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支持着各国和全球的经济。因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不仅构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方面，而且与整个发展有广泛联系，包括经济和社会层面。

为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开支和行动，应视为执行 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更广泛投资需要的一部分。

生物多样性对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目标至关重要，应该同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目标和指标一道纳入所有其他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领域。与此同时，如果实现足够的政策一贯性，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有助于创造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有利条件，包括改进机构、政策制定、提高人就自然世界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同样，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手段”的讨论，与生物多样性资源调动议程相辅相成，在全球和各国将生物多样性充分纳入 2015 年后框架，将有助于减少生物多样性的资金需要。

实现爱知目标将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和税收流量，支持新的经济和企业机会。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资本的基础，自然资本平均占低收入国家总财富的 36%，并支持“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基于自然的投资将是追求包容性绿色经济运动的不可或缺

³ 又称绿色基础设施。

的组成部分。可持续农业与技术发展同样很可能提高收入；建立保护区将为旅游业创造新机会；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和恢复生态将创造就业。

主要信息 3：

生物多样性有助于气候变化缓解、适应和复原力

对生物多样性的投资能够有效降低国家和社区的脆弱性，增强复原力和在各种大小范围帮助适应与气候相关的影响，并大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包括有助于实现缓解目标。

维护健康的海洋和恢复及保护森林和湿地，是缓解气候变化的关键战略。在 2030 年前做到将毁林减少一半，将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 15 至 27 亿吨二氧化碳，从而避免气候变化的损害，据估计（2008 年伊莱亚斯），这种损害在全球超过了 37 万亿美元（净现值）。众所周知，碳储存在未受损的森林中比在破碎的退化森林中恢复较快。其他缓解措施，包括保护土壤碳、减少湿地、海上和农业系统的排放。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可以具有成本效益，并产生对社会的多重效益。

人类、特别是贫困者容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与生态系统服务所受影响有着密切的关联。对生物多样性的投资可以提供直接的适应力惠益，包括沿海保护（例如因恢复红树林和珊瑚礁）、洪水调节（因保护森林和湿地）和保护人、畜不受阳光照射。这些投资将提升恢复能力，包括通过保障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确保生计选择。这将在帮助社区适应气候变化和尽量减少损害与损失中越来越重要。

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基于生态系统的缓解和适应力的多重影响，还有必要提升这些措施适应气候的能力。与此同时，有必要提高认识，在拟订更广泛的气候变化缓解与适应政策和办法时，考虑生物多样性中的权衡和共同惠益办法。还应该承认地方社区在协助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缓与适应方面的作用。

爱知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之间的协同增效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改进空间。

爱知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之间有着重要的协调与相互依存关系。为碳减排而投资于“降排+”非常重要，不但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有助于保障生计，但条件是必须建立充分的保障措施和处理好潜在的权衡。⁴ 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适应力解决方案可以具有成本效益，并有助于实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

主要信息 4：

对生物多样性的投资可以加强向弱势社区提供其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服务

由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对弱势群体具有严重的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投资将确保长期提供关键性的服务和获取极端重要的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些资源对粮食安全、经济机会、人类福祉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⁴ 见《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CP.16 号决定附录 1，“关于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问题之政策方针和积极奖励的指导意见和保障措施；和在发展中国家中保护、可持续管理森林和提高森林碳储存的作用”，见 2011 年 3 月 15 日 UNFCCC/CP/2010/7/Add.1 号文件，第 26-27 页。<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0/cop16/eng/07a01.pdf>，2012 年 8 月 17 日获取。关于“降排+”，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提供了关于采用生物多样性相关保障办法的咨询意见，UNEP/CBD/COP/11/24，2012 年 8 月 24 日执行秘书的说明，<http://www.cbd.int/cop11/doc/>，2012 年 10 月 1 日获取。

区域证据显示，发展中国家中的弱势社区特别依赖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全世界大约 70% 的贫困人口——约 8.7 亿人——生活在农村地区，许多人的生存和福祉直接依赖生物多样性，包括直接提供粮食、燃料、建材、清洁水、药用植物、和其他必需品。

对于世界上许多贫困人口和弱势社区而言，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相关的传统知识是他们的主要资本资产，对那些可能没有选择办法的人提供了选项。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大部分经济和就业是基于土地的部门。生物多样性提供多种多样的生计选择，包括开办小企业的手段。这可能是危机时期贫困家庭的生命线。生物多样性为农村和沿海贫困人口提供了“社会安全网”，提供野生蛋白质以补充农业和依赖自然的生计，使农地收入多样化，并调节小农农作的丰欠起伏。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对于可持续和公平分享大自然在创造这种社会经济机会中所提供的惠益至关重要。

采取生物多样性行动需要考虑到分配的影响，确保贫困人口和弱势社区的惠益得到保障。

采取生物多样性行动需要审慎地考虑地方社区的需要，以确保查明并解决潜在的负面影响。那些帮助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和其他自然资源运用者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中获得较大比例的计划，会增加对采取保护的奖励，帮助实现爱知目标。所有这些计划都要求对财产或获取权利有适当的认识、分配和保障。考虑和处理好在地方社区内——包括妇女——货币与非货币惠益的分配，很可能会提高关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各种活动的成本效益。

主要信息 5：

生物多样性提供保险和选择价值

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投资可提供对未来环境变化中不确定和加速情况的保险，保持和增加对未来发展的选择。现在的投资将减少未来的成本和保留今世后代的机会。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是很重要的，不仅因为它们目前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很广，并且因为它们为降低风险和提高发展机会提供保险和潜在选择上的价值。“保险”和恢复力密切相关，生物多样性在维持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上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应付生态失调或变动。保障关键的生态资源和生态功能，将提高“渡过”冲击——如极端事件——的能力。保障物种和种群将保护生命的基因多种多样，以及可能与此相关的当前和未来的潜在价值。因此，健康的、功能健全的、有恢复力的生态系统正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是许多社区的一种“生命保险”单，提高跨部门的惠益，包括降低灾害风险、粮食安全、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和生计多元化。

现在不投资生物多样性，将增加未来的风险和成本。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世界粮食署，2014 年）发现，8 个最严重的全球风险中 4 个是源于生态系统。不采取足够的行动去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将冒着丧失当前和未来惠益的风险，这些惠益在未来可能变得至关重要。

当前执行的阻止生态系统退化的战略将减少未来恢复的成本，减少对昂贵的生产生态系统替代品的需要，同时也减少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成本。

主要信息 6:

加强协同增效、处理权衡问题和促进跨部门政策的协调一致，是有效执行爱知目标的前提条件，并对资源筹集尤为重要

制定跨部门协调一致的目标，以制定和执行相辅相成的政策与活动并且加大力度管理各种权衡，这些都是实现爱知目标，带来共同惠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而确定有成本效益之途径的重要步骤。这将有助于确定共同的供资机会，从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获得捐助来实现爱知目标。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更广泛的政策议程、计划和预算的主流，为更高效的决策过程和共同供资提供了重要机会，但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对于生物多样性部门与其他政策领域，包括发展、增长、扶贫、气候变化、农业、林业、渔业、水利、卫生等领域之间的规划及落实工作，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作法，再加上更协调的资源部署，对帮助解决冲突，带来共同惠益，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爱知目标至关重要。

在核算和报告系统中努力把握生物多样性方方面面的价值能极大地促进资源筹集工作

诸如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财富会计和生态系统服务定值（WAVES）伙伴关系，联合国统计司正在拟定的环境经济和生态系统账目统计标准，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下计划的一些研究等举措，以及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的相关工作，都正在扩充工具箱以便在核算和报告系统中以及决策中把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范围。更多地使用这些工具来支持改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决策，可能会大大促进长期人类福祉和可持续性。

加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科学政策接口，可以是塑造治理体系主流化的关键力量。

有效地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所关注的问题，纳入其他部门及其资源使用和投资的计划，将需要充分了解并认识这些问题与那些部门的相关性及价值。随着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建立及其第一个工作方案的采用，就大有可能以更一致的方式并通过知识部门和政府都认可的进程，来提供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性及价值方面的信息。

主要信息 7:

所有国家都需要对各种机构和政策框架、直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行动、奖励措施和经济手段进行投资

一致的和精心设计的机构以及政策框架，是有效和高效的生物多样性筹资的前提条件。

有关的完整报告提出了实现爱知目标所需的投资类型，并对在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投资需求的证据进行了审查。这表明，对投资需求“自下而上”的评估，大体上与高级别小组（2012年）提出的对实现每项目标所需投资的“自上而下”的全球评估是一致的。

在政策框架和一般有利条件方面的投资，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欧等的欠发达地方，是生物多样性行动的先决条件。提高认识、建设能力、发展知识基础以及建立必要的法律结构、制度和治理框架，都是有效实现所有爱知目标并直接推动目标 1-4 和 16-20 的前提条件。在一些地区，比如北美、欧洲和澳大拉西亚，促成的框架一般都比较发达，但在提高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认识，提高对生态系

统服务的理解，将知识和认识纳入奖励措施、部门政策、公共和私营部门决策过程等方面，仍需要有更大的进展。

缺乏适当的体制框架和决策过程对实现相关目标构成的障碍，可能与缺乏资源雷同。有效的行动将需要一致的政策，经改进的机构与加强的治理，全球至地方各级的所有相关行为方的参与。

各国需要在直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行动、制定奖励措施和经济手段、技术等方面进行投资。它们需要处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推动因素。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其他政策领域主流方面的投资，对所有区域都是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由于很多国家对生物多样性的行动没有足够的供资，于是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与扶贫、可持续生计和自然资源管理有关的其他政策议程的机会则是重要的。

有必要尊重并学习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知识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养护做出的贡献，包括承认产权和加强他们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的参加和参与。

主要信息 8:

设计并实施适当经济和政策手段，对于制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至关重要

以最低成本实现爱知目标将需要更有效地利用公共预算，以及运用更广泛的经济手段和奖励措施。

实现爱知目标所需的行动要求有巨大的投资，与此同时，鉴于非常现实的各种制约，将不得不作出权衡和确定重点。然而，通过赠款和政府供资获得的资源，可以并且应该用更好的财政策略，提出更好的奖励措施，尽可能鼓励私营部门的投资等加以充分利用，同时承认多重惠益和受益人。同样，各国政府要在创造允许私营部门进一步参与的有利条件方面发挥作用。

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手段，包括奖励措施和经济手段的范围，必须扩大规模并更加雄心勃勃。这些都需要设计和实施以确保它们的环境效益、成本效益以及尽可能的公平分布。

通过逐步淘汰不正当奖励措施和不可持续的做法，并扩大良好的土地利用与海洋规划和制定绿色财政政策便可收获颇丰。

取消对环境有害和使市场扭曲的各种补贴，包括那些支持农业、渔业、林业和采掘业的补贴，如果管理得当，将可以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并释放出可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更具成本效益的发展战略的其他投资资源。在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方面积极主动的投资，若不首先或至少同时取消对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的补贴，其效果将大打折扣。在全球范围，据估计，去除有害的渔业补贴（目前达到约 192 亿美元），将有助于到 2020 年获得回馈渔业 1,248 亿美元（776 亿–1,706 亿美元）的净收益（哈丁等人，2012 年）。查明和处理补贴改革之障碍的进一步工作，将有助于这一进程。

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些惠益，将激励那些支持资源筹集与促进经济效率、市场准入、收入多样化、财政改革和私营部门投资等方面的政策决定。这也将向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和决策者发出清晰一致的信号。

在正确的体制框架和适当的保障措施下，环境财政改革、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抵消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绿色产品市场、以及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气候变化问题筹资和国际发展融资（除其他手段外，如经合组织和其他机构审视的那样），如果能够明智地实施，都会为打到这一目的带来巨大的潜力。

主要信息 9:

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货币和非货币性惠益经常大于成本

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惠益，已显示出大大超过所有区域及对大量爱知目标的投资成本。根据高级别小组（2012 年）对年度投资需求总量的估算，生物多样性行动所需的全球人均投资的平均数，估计约在 20 美元与 60 美元之间。⁵ 这意味着投资需求的范围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0.08% 至 0.25%。

高级别小组（2012 年）的第一份报告，通过对相关 20 项目标之每一项总计的全球“自上而下”的估计数，提供了全球实现爱知目标所需资源水平的第一次总体估算。通过把对每项目标确定的资源需求简单相加，落实相关的二十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需要的资源，估计每年在 1500 亿美元至 4400 亿美元之间。这些估计数包括了现有支出。

区域一级和国家一级的证据，大都支持高级别小组在其第一份报告中对全球资源需求所做的估算。但是，由于投资需要有多重惠益，这些资源只有一小部分需要从专门的生物多样性预算中寻找。

高级别小组（2012 年）报告中关于资源需求的自上而下的估算，与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可用的评估大体一致。凡有差异之处，证据往往表明，该小组第一阶段的估算可能对一些目标过于保守。尤其是，高级别小组（2012 年）自上而下的全球评估，对一些目标做了较低的估算，这是较之于对一些高收入地区，如欧盟（因那里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都高）的估算中所建议的估算而言。此外，高级别小组 2012 年报告中对目标 2-4 的估算，与一些其他的评估相比偏低，因为它们“是基于研究和计划的成本，而不是为实施政策变化所需要的全部资源。

据估计，主要和直接集中用于生物多样性的支出，仅占实现爱知目标所需的全球资源总量估算的 18%；相关投资的另外 25% 将用来支助气候行动和其他的生态系统服务；而大部分的支出（估计约占总数的 57%）将通过对污染和外来入侵物种的控制，用于支持更广泛的可持续性及在重点部门推广可持续性。言下之意是，所确定投资的少部分将需要来自专门的生物多样性预算，但大部分可以通过公共预算以及对私人在农业、林业、渔业、水利、控制污染和气候行动等方面支出重新优先排序来共同出资。

主要信息 10:

有必要大量增加投资，弥合筹资缺口

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估算都指明，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所需投资同目前资源配置之间存在重大缺口。所有爱知目标的情况都是如此。

⁵ 以全球人口约 70 亿为基础。

高级别小组第一次报告的结论是，大多数爱知目标所需资源同当前国家和国际配置的资源之间存在着重大缺口。

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评估都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有一项审查估算，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年供资额在 510 亿至 530 亿美元之间，而估算的年需求为 3,000–4,000 亿美元（帕克等，2012 年）。据估计，全球当前用于物种保护的支出不足所需数额的 1/8，用于保护区的数额不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 1/3，占发达国家需求的一半。全世界所有区域对于大范围的生物多样性行动所作区域和国家评估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生物多样性行动专用资金需要增加，但是不会充足。唯有通过重新调整现在用于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支出（特别是目前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支出），并通过完善行业整合，才能弥合资金缺口。处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和间接驱动因素所需的大部分资金可实现多重目标，并需要将生物多样性行动纳入现有预算主流。

建议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2014 年）的调查结论是，全球八大风险中，有四项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该报告提供的证据表明，不执行 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目标引起的社会成本在许多情况下远远高于执行所需的成本；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行动不足，具有损失当前和未来惠益的风险，这在未来可能变得十分重要。

因此，所有国家应当制定计划，弥合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实施保护脆弱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核心生物多样性养护举措，需要国家扩大财政基础，增加持久的、可预见的资金供应。为了解决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国家需要将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纳入所有行业的主流，并且需要私人资金来重新调整当前支出。

高级别小组为此建议了一系列行动，小组认为如果全部实施可使国家大幅减少额外资源需求，并且提高用于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支出的成本效益。这些行动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等重要。高级别小组预计其建议可有助于国家和其他利益有关方采取的直接行动，也有助于进行中的能力发展工作。

1. 所有国家应继续紧抓时机评估融资基准、需求和缺口以及全方位的潜在融资来源，并查明提高国家生物多样性支出的成本效益的机会；在国家层面利用这一信息以了解哪方面需要进一步的行动，并帮助确定潜在的资金来源。国家的经验，包括从生物多样性筹资倡议学到的教训应当予以记载、收集和分享，包括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信息交换所机制（信息交换所机制）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论坛，并且应当开发加速学习的支持机制。发达国家捐助方和缔约方应当考虑向各国提供双边和多边支助，以实施生物多样性筹资倡议办法中包含的步骤。
2. 国家应在扩大的、多样化的长期和可预见的资金来源的基础上，制定战略和政策，弥合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包括通过中期支出框架承付公共资金。国家应大幅提高和补充国内生物多样性预算，比如，通过新的和创新的财务机制⁶和加强现有举措的力度。重新调整当前支出必须处于弥合缺口工作的中心地位。政府通过激励措施和经济文书，即拟订和执行必要政策并创造有利条件，于具有适当保障的情况下，也可以在从私营部门杠杆性融资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⁶ www.cbd.int/financial/innovations/

3. 需要理解、介绍和认识对海洋、淡水和陆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投资，可解决面更广的问题和挑战。这要求更好理解和宣传运作良好的生态系统的多方面惠益以及自然解决办法替代人为解决办法的价值所在。国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应当利用现有研究提供的证据，比如高级别小组区域评估，来阐述各行各业对生物多样性投资的商业价值，宣传其惠益，以及不行动和拖延投资的成本，尤其是对社会贫穷阶层的成本。与养护相关的国家各部、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应当以适合国情的建议在这方面同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其他国家政府机构、多边和双边捐助机构和开发银行等沟通，集中强调生物多样性在交付预期它们应交付的目标方面的作用。这可有助于支持将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目标纳入国家和区域发展计划和预算主流，实际上支持各行各业所需的变更。这一证据还应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和区域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4. 在制定国际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计划时，国家应当确定行动，以此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主流，这可直接促进实现这些宗旨和目标，以便鼓励生物多样性积极发展的决定。这可对包括粮食保障、饮水安全、减少灾害风险、生计和减贫和国家安全及国民收入等做出贡献。国家应当为此探索具体机制，例如在适当的生物多样性和社会保障下的生态系统核算，并确定和促进公共部门政策的具体转变，以消除有损生物多样性的奖励和补贴。国家和地方各级的生物多样性行动应当考虑到分配的影响，确保贫穷和弱势人民获得惠益。
5. 作为一种更广的主流化努力，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项目和方案同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之间的联系。这有可能为生物多样性行动争取大量额外筹资。这包括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其国家气候变化政策框架，和制定基于生态系统的办法去适应和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办法可以创立可持续的和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6. 各国政府应当举办政府、私营和民间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广泛对话，讨论将养护和可持续使用原则纳入各行各业的理由和切实可行的备选方案，以便增加筹资和协助将养护和可持续使用目标主流化。在确保以跨行业方式修订和执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时，国家应当为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尤其是规划和财政机构，确定相关的作用和责任。这种办法对于实现获得广泛支持的资源调动计划，促进实施关键的战略和行动至关重要。
7. 土著和地方社区的集体行动、努力和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配置的知识等实物贡献，应当获得尊重，并在设计干预措施，配置资源和实施时给予考虑。这应当包括澄清和尊重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资源权，并使他们更多参与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和计划的选择和运作。
8. 人力和体制能力发展方案，应当包括在制定有效政策和文书促进主流化，支持增加对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投资时，更加注重分享实用知识和经验；并加强区域和南南合作的作用和支持。也应当从现有的伙伴关系办法，比如，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有议程，包括被财富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估值项目、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⁷）利用

⁷ <http://www.teebweb.org/>。

的共有议程，和国家的具体办法，比如“地球母亲”办法中，⁸寻求并吸取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经验教训。

9. 各国应当将促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行动的经济原理的意识，及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纳入培训、教育和能力建设方案。中学和大学教育课程以及新的和现有的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培训方案中，应该包括相关的模块，那些以企业管理为重点的尤为重要。
10. 各国应当在其地方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包含关于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现状和趋势的稳健和可核查的基准和指标，这将有助于跟踪和评价对生物多样性的投资带来的惠益，并促进更加广泛获取惠益。在这方面，高级别小组建议使用自然资本绘图作为评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工具；基于社区的监测和信息系统；进一步研究生态系统核算和评估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阈值；以及开发和应用其他适当的方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负有支持这些努力的重大作用。
11. 应作出投资，增进对于生物多样性保险价值的了解和加强对于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的学习过程，以避免危险的临界点和制度的转变，从而以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增加可持续发展和福祉的可能性。应将此种做法用于政策和实践，包括采用适当的财政措施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受到了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关联性的知识的更好指导，同时也保证了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相关的保险价值。可采用一些方法对其进行指导，例如：生态系统评估，⁹复原力评估，¹⁰基于社区的复原力分析（CoBRA）¹¹和战略环境评估（SEAS），包括附有情景分析的相关风险评估，并采用预防性办法。

⁸ http://ucordillera.edu.bo/_descarga/livingwell.pdf。

⁹ <http://www.ecosystemassessments.net/>。

¹⁰ http://www.resalliance.org/index.php/resilience_assessment。

¹¹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environment-energy/sustainable_land_management/CoBRA.html。

附录

高级别小组成员		
主席		
Carlos Manuel Rodriguez 先生，哥斯达黎加		
博茨瓦纳	Hillary Masundire 博士	博茨瓦纳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
巴西	Roberto Brandão Cavalcanti先生	环境部生物多样性与森林司秘书
加拿大	Ussif Rashid Sumaila 博士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渔业中心和渔业经济学研究部主任
中国	Zhu Liucai 先生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生物多样性办公室主任
	Wang Xin 先生	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主任
哥斯达黎加	Carlos Manuel Rodriguez先生	国际养护组织副主席兼高级顾问（全球政策）
德国	Heidi Wittmer 博士	Helmholtz 环境研究中心（UFZ）环境政策处副处长
印度	A Damodaran 博士	印度管理研究所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室教授
墨西哥	Mariana Bellot Rojas 女士	国家保护区委员会（CONANP）体制发展和促进总局总干事
挪威	Tom Rådahl 先生	环境部秘书长
菲律宾	Rina Maria P. Rosales 女士	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资源问题经济学家
南韩	Tae Yong Jung 博士	韩国发展研究所（KDI）公共政策和管理研究室教授
瑞典	Maria Schultz 女士	斯德哥尔摩恢复力研究中心恢复力与发展计划部主任
联合王国		联合王国国家生态系统评估共同主席

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观察员		
全环基金秘书处	Mark Zimsky 先生	自然资源问题高级生物多样性问题专家
经合组织	Katia Karousakis 博士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发展司 经济学家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秘书处	Salman Hussain 博士	协调员
开发计划署	Nik Sekhwan 先生	发展政策局环境与能源小组 代理主管
	Caroline Petersen 女士	政策发展局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负责人
	Yves de Soye 先生	生物多样性融资（BIOFIN）倡议 主管
	Jamison Ervin 博士	生物多样性融资（BIOFIN）倡议 技术顾问
环境规划署	Bakary Kante 先生	环境法和公约司 司长
	Alphonse Kambu 先生	环境法和公约司 方案干事
世界银行	Valerie Hickey 博士	生物多样性问题专家
政府观察员		
欧洲联盟委员会	Laure Ledoux 女士	环境总局 生物多样性股
印度	Hem Pande 先生	环境与森林部 增设秘书
日本	Rikiya Konishi 先生	环境省自然保护局 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办公室 副主任
挪威	Solhaug 女士	环境部生物多样性、户外娱乐和文化遗产部 高级顾问
联合王国	Jeremy Eppel 先生	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部 国际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证据司 副司长
	James Vause 先生	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部 自然环境经济学 生物多样性问题经济学家
	Richard Earley 先生	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部 国际生物多样性政策顾问